

“小美人鱼”亮相世博 丹麦文化营销有术

毛 莉

“当着丹麦人的面,如果你指责他们的国王,他不会理你;如果你批评他们的乳酪,他们会说你无知;如果你提到安徒生而没有尊敬的表情,你可能会挨耳光。”安徒生是丹麦人不容置疑的骄傲。4月2日是安徒生诞辰205周年纪念,这一天,全世界再次想起了那位编织了无数动人童话的丹麦人。而就在不久之前,坐落于哥本哈根市长堤公园的“小美人鱼”铜像告别了家乡,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即将成为上海世博会丹麦馆中的一景。

丹麦人“不舍” “小美人鱼”离开

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小美人鱼……提起这些安徒生童话作品里耳熟能详的名字,相信很多人都能唤醒来自童年的温馨记忆。安徒生的童话作品广受欢迎,在全球翻译成语种数量仅次于《圣经》。丹麦人也善于利用各种机会把这种个人的情感体验扩大为公众的集体共鸣。

举世闻名的“小美人鱼”铜像取材于安徒生作品《海的女儿》,被视为丹麦整个国家的象征。“小美人鱼”给丹麦增添了浪漫而温情的色彩,到哥本哈根看“小美人鱼”铜像,也是很多人到访丹麦的最大心愿。去年,哥本哈根市议会批准丹麦经济与商业事务部借用“小美人鱼”参加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意味着,在哥本哈根近百年的历史中,“小美人鱼”将首次“消失”。对于“小美人鱼”的离开,不少丹麦人感到依依不舍,但哥本哈根市长弗兰克·延森坚定地说:“把‘小美人鱼’送去中国,我们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我相信她是一位优秀的丹麦形象大使,尤其是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安徒生童话。”

“小美人鱼”远游他乡,同样可能对哥本哈根的旅游业造成影响,对此弗兰克表示:“虽然‘小美人鱼’去了中国,但我们已经邀请一位著名的中国艺术家制作了一个视频装置,安装在长堤公园内,暂时代替‘小美人鱼’。我很高兴,通过这个视频装置我们还是可以在丹麦见证她远渡重洋的旅程。”据悉,在上海世博会期间,该视频装置将实时播放“小美人鱼”在上海丹麦馆内的现场录像。每当北欧夜幕降临之时,“小美人鱼”的美妙之旅就会呈现公园内的大屏幕上,以解丹麦人对她的相思之苦。

打造世界级的文化名人

丹麦国土虽小,但在宣传推广安徒生时,却有着包举宇内的雄心。人们也许至今还没有忘记,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时,世界上每一块有人类居住的大陆共同纪念安徒生的盛况。不仅如此,丹麦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多项以安徒生命名的文化盛事。

3月29日,刚刚公布的国际安徒生奖就是其中之一。国际安徒生奖是目前世界儿童文学界公认的最高荣誉,因其独特的地位,人们常常称它为“小诺贝尔奖”。这个由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赞助的奖项自1956年设立以来,每两年颁发一次,主要授予儿童图书作家和插图画家。今年,来自英国的大卫·埃尔蒙德获得国际安徒生作家奖,德国女插图画家尤塔·鲍尔获得国际安徒生插图画家奖。

近年来,颇受关注的国际儿童图书日最初也以安徒生的名义设立。1967年,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把安徒生诞辰日定为国际儿童图书日,以唤起人们对读

书的热爱和对儿童图书的关注。总部设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1953年成立,是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咨商关系的非政府、非营利性组织,在国际儿童读物出版和研究领域拥有权威地位。目前,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已有70个国家分会。每年选定一个国家分会主办国际儿童图书日活动,由其确定当年的活动主题,并邀请本国一名杰出作家和一名著名插图画家分别为全世界儿童写一篇文章和设计一份海报,用以推销图书和促进阅读。许多国家分会还通过媒体、学校、公共图书馆等组织活动来宣传国际儿童图书日,并组织小读者与作家和插图

画家见面、作文竞赛或图书评奖等多种活动。

安徒生成为文化摇钱树

安徒生在现代丹麦社会仍具有独特的影响力,处处可见他的影子。他创作的游记和大量不同主题的童话,如今也正发挥着始料未及的作用,甚至有人认为他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丹麦的国民性,可以通过他的作品来理解自我价值。丹麦人对这位文学大师历来持尊重和欣赏的态度,在评选“历史上最伟大的丹麦人”的活动中,安徒生毫无争议地名列榜首。安徒生和他的童话也早已成为丹麦开展对外交往的重要纽带,成为了丹麦对外宣传、吸引国



“小美人鱼”在上海世博会开交馆。

在全球视野中汲取艺术营养

访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主任唐建平

本报记者 屈茜

再去“西天”取真经

提起4月份的这次文化交流,唐建平说:“1000多年前,玄奘去西天取经。如今,国人去‘西天’演奏佛教交响乐——这可以理解成中国佛教文化的回访吧!”

《神州和乐》将中国佛教音乐与西方交响音乐融为一体。回忆起创作构思,唐建平表示,《神州和乐》不是实用性的佛教曲,也不是纯粹的交响乐,而是在新理念下创作的音乐作品。“佛教音乐给大家的印象往往是在寺院中演唱的,如今要把它变成交响乐的形式推向舞台,首先需要转变观念。”他保留了原有的佛教题材,并用交响乐的形式加以演绎,希望让听众感悟到佛教对生命的关爱。深圳交响乐团曾经把它带到东南亚、韩国、德国等地演出,总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把音乐和文化进行融合,《神州和乐》不是第一次。这些年来,唐建平一直在实践把音乐与中华文化相结合。1994年,唐建平创作的九重奏《玄黄》在台湾参加比赛。“那是一部特别现代的音乐,一般情况下这种风格会得到评委的好评,但却难以打动观众。然而,这部作品不仅得到了评委的最高分,也被观众评选为第一名。”回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依然很兴奋。唐建平感慨道,随着当今世界文化不断的交融和发展,一个观念已逐渐被当代艺术家所共识,那就是任何一个优秀的艺术家都不可能离开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土壤。

在全球视野中汲取艺术营养

“文化应该随着时代进步,而不能固步自封。中国的传统文化值得我用一生去尊崇和弘扬,同时也应该吸收全世界的文化,这样中国文化才能发展得更好。”唐建平说,有些音乐能够超越时代和民族——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做到这一点需要艺术家必须有开阔的胸怀、高远的眼界、高尚的情操,这样创作出的音乐才可以拥抱全世界。作品《圣火2008》就把文化触角伸向了更远的时空——这部为2008年奥运会而作的音乐从普罗米修斯为人类

盗火切人,描写了那种为人类幸福甘受大苦、奉献大爱的精神。

《彩云飘过山冈》是由唐建平作曲的音乐剧,并在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期间上演。在这部剧中,他努力突破音乐剧语言和国际流行音乐风格的瓶颈,在音乐的精神层面探索和确立中国风格,又把欧美歌剧中的流行乐、爵士乐与中国的民族音乐、流行音乐结合起来,使剧目既有了西方音乐剧的律动和节奏,又具备了音乐的语言情景和文化元素。

“听得懂”不代表受尊重

在多次参与国际文化交流中,唐建平对一种现象感到焦虑——在一些国家演出时,我们的组织者对对方的文化需求往往存在误判。“在选择演出曲目时,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能让外国人听得懂。事实上,听得懂的音乐不一定被他们尊重,而听不懂也不代表不喜欢。包括在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演出中,我们多习惯于展示性的曲目,如:《春节序曲》、《百鸟朝凤》、《赛马》等“通俗易懂”的曲目。然而结果却是,外国人认为中国的音乐作品不够深刻。”在唐建平看来,文化交流演出不是一般的消夏音乐会,应该拿出更有分量的音乐作品,而且音乐要能够反映当代的创新。

当前,中国的音乐作品在国际重要艺术节上——如瑞士的琉森艺术节、奥地利的萨尔茨堡音乐节等——展示的机会还是不多。其实,国内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会让外国人肃然起敬,可这些作品很少能够形成规模、完整地呈现在国际舞台表演。“是该转变观念的时候了。”唐建平说,在宣传和推广民族、民间音乐,展示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音乐之外,应当重视当代的中国原创音乐,要扶持和推广那些不太“听得懂”,但却代表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成就和音乐创作水平的新作品。

唐建平希望将来能带着《神州和乐》、《成吉思汗》等作品去欧洲、美国、澳大利亚等地演出,他相信这些作品的艺术力量不会让观众失望,相反会让世界认识到中国音乐中蕴含的巨大艺术能量。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 “我的非洲故事”征文

文化部外联局与本报合办

邮 箱: whbgib@163.com
电 话: 010-64296360

1988年初,在素有“洁白的城市”之雅称的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诞生了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组织——阿尔及利亚武术协会。协会会址和其所属的中国武术馆位于人口稠密的卡斯巴老区附近的“凹地之门”,馆内地面上铺有厚厚的大块练功垫子,四壁挂满了中国画,顶梁上悬挂着许多大红灯笼。当你步入大厅,仿佛就像回到了古老的中国,走进了极富中国特色的比武大殿,来到了武僧的故乡——少林寺。

阿尔及尔中国武馆的成立主要归功于该协会和武馆的创始人,即现任主席兼总教练的阿姆兰·加麦尔。当时他还是个26岁的小伙子,身材魁梧,留着寸头和短短的

加麦尔和他的“中国武馆”

文隆胜

胡须,显得格外健康帅气。加麦尔原是阿旅法侨民的后裔,13岁开始在法国尼斯跟一位来自越南的武师学习中国武术,以后又跟来自柬埔寨的旅法华侨切磋。在法国上大学时,加麦尔是学经济专业的,但他酷爱中国武术,毕业后便放弃了经商,全身心扑到传播和发扬中国武术的事业上。

从法国返回阿尔及利亚后,加麦尔一边传播中国武术,一边着手筹划成立阿尔及利亚武术协会和武馆。他克服了经济上、物质上和观念上的重重困难,筹资60余万第纳尔(当地货币单位),亲自动手锯木料、劈竹子,终于在一个废弃木工车间的基础上建成了阿尔及利亚历史上第一个颇具规模的中国武馆。1989年,该协会终于得到阿内政部的认可和批准,并且越办越红火,成为了一个很受欢迎

的民间体育团体。加麦尔本人也曾多次来到中国参加武术比赛和国际武术会议,几次获奖并被选为国际武联非洲执委会主席和技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武术在阿尔及利亚的影响不断扩大,特别是自武馆开办以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员,有的已熟练地掌握了几套拳路,其中有10来个学员,成为了主教练的助手和代理教练。如今,每当中国人进入这个“凹地之门”,或在阿尔及尔街上碰面,便会有青少年向你拱手抱拳致意。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身着黑色“中国功夫”服的青年人,他们以身穿这种服装为时尚并感到自豪。

如今,阿尔及利亚武术协会受到阿青体部的重视,甚至把“中国武术”纳入到国家体育项目中。近几年来,加麦尔又培养出多名水平较高的弟子。弟子

听受害者倾诉酒后驾车如何给他们的和家人的一生造成痛苦和不可挽回的伤害。

美国如此,其他许多国家也是如此。在西班牙,酒后驾车属于刑事犯罪;在日本,对酒后驾车实行的是“连坐”式处罚,除对

酒后驾车者本人严加惩处之外,还对提供酒水、车辆以及同乘的人员实施严格处罚;在法国,对酒后驾车行为实行的是绝对“零容忍”制度,酒后驾车被视为极度不尊重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至少是被判以巨额罚款和扣分,动辄就可能判刑。在德国,一旦因酒后驾车被禁驾,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同样被禁止开车。

笔者认为,各国对酒后驾车施行“零容忍”的严厉政策,主要考虑到了以下两点因素:

1.喝酒驾车的人明知知道驾车行为肯定危害交通安全和他人生命安全,还一意孤行,这不仅是对公共财产的故意毁坏,更是对他人宝贵生命的一种藐视,从某种意义上讲,与蓄意谋杀生命并没有多少本质上的区别。

2.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一个公共环境和谐的社会,必须依赖于每个公民对自己的行为有所约束、有所自控,能够承担起起码的社会责任。但是仅仅依靠单个人的自我约束,往往又很难完全奏效,必须借助制度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监督,对于违反法律、妨碍社会和谐的人进行重罚,是理所当然的,也是为了使大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

不过,在我们为我国对于酒后驾车的处罚终于变宽为严,对久抓不禁的酒后驾车行为宣誓“零容忍”大声叫好好的同时,也深切期盼我国能够参照国际上的其他一些通用做法,对腐败、环保等长期无法根治的社会问题,也能实行“零容忍”的重典处罚,相信一定能够收获令人满意的奇效。

酒后驾车『零容忍』,国际通用

汪 融

非洲小贩的雷人汉语

徐铁人

在比勒陀利亚,我住的酒店对面就是南非总统府。也许是位于缓坡上的缘故,这座百年建筑虽不以豪华壮观取胜,却有着某种欧洲古城城堡的感觉。参观南非总统府不仅是我,也几乎是所有观光客游览比勒陀利亚必选的选项。站在总统府所在的缓坡上向下看,比勒托利亚现代化的城市景观一览无余。总统府门前还有个非洲工艺品市场,虽然只有十几个摊位,但在这里买点纪念品则是很多游人另一个不可错过的项目。

一个卖木雕的小贩开始只会说一句“你好”。我又教了他一句北京话:“冰棍儿,来一根儿!”他学习起来格外认真,不过听起来却让人忍不住想笑。我又在一个姑娘的摊位前看了看她卖的邮票,没想到刚转身要走,她居然说了句:“给你,便宜!”说实话,发音还挺标准。我一高兴花60块钱买了几张南非前国家领导人的肖像邮票。

另一个小贩卖的是用铁丝编织的艺术品。见到我以后,说了句

很雷人的话:夺(多)棒啊,买了吧!”不用问,这位肯定是来自北京的“师傅”教出来的——北京话口语里喜欢把“多”念成“夺”。

汉语说得最雷人的是一个卖木雕犀牛的小贩。因为木雕太沉,我根本就沒打算买,所以也就没在他的摊位前逗留。刚买了些轻便的东西正准备走,这位胖哥嘴里竟然冒出了两个字:“走啦?”你说雷不雷!我也就顺势回了句“走了”,并朝他笑了笑。本以为他会跟一句“慢走”,可惜人家没吱声。要是再加上这句就更牛了。不过,我准备有机会再去找他,把这句教一教。反正住得近,说不定去了以后还真能在他那儿买点什么东西呢。

忽然想起去年在维也纳,也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雷人的小贩。当时那位卖画片的老兄正在和中国游客搭讪,他竟然用半英文半中文的话问那位中国游客:“Do you know Jin Se Da Ting(金色大厅)?”我从旁边经过时,禁不住笑出声来。如果说在韩国常常能碰到会说中国话的小贩,是因为离得近、去的中国人多,维也纳的小贩会说中国话也是因有中欧人员往来越来越频繁,没成想,到了太阳在北边儿的南半球居然也能碰到那么多会说中国话的小贩,看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还真是越来越大了!

几天以后,我去了另外一家更大的市场。没想到的是,这家市场里几乎所有非洲小贩都会说几句中国话。一个小贩知道我是中国人以后,便迅“雷”不及掩耳地对我说“毛主席万岁”——这都哪儿跟哪儿啊!